引　论

进入20世纪以来，新疆作为中国第一大省区，在祖国这个统一的大家庭中，与全国兄弟省区一样，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历史时期。由于新疆地处西北边疆，居亚洲大陆腹地，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它所走过的近一个世纪的政治变革的历程又有着与一般兄弟省区所不同的特殊性。

一、辛亥革命在新疆的胜利和失败

19世纪，中国对世界的认识还是立足于确信自己是世界中心的基础之上的，既然是中心，就不可能承认还有平等或竞争的余地，就不愿意借用外来的文化与思想。这种世界观使得中国人适应现代知识、制度和科学技术相当困难，清朝统治者的专制主义和对汉文化的自卑意识又使得中国人的这种世界观在清代变得更加僵硬和绝对。总之，中国人的这种世界观实实在在地妨碍着对社会变革紧迫性的认识，在整个19世纪一直阻碍着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基本变革。

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轰开了古老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西方列强的侵略构成了19世纪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的成分。鸦片战争的失败、《南京条约》的被迫签订，开始被人们奇怪地称之为‘中国开放’的过程。这一过程迫使中国承认帝国主义国家对所谓‘国际平等’的解释，并迫使中国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弃了老大自居的心理。列强在打掉清廷的惟我独尊，俯首听命之后，看到了与清王朝打交道，将胜过任何它们可能设想的替代性政权，清王朝已成为外国在华侵略格局的组成部分，而公开瓜分中国亦将是代价昂贵、后患无穷的。列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野心和清王朝一系列让步，触发了戊戌变法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的失败和义和团的灾难性后果使得清朝统治集团认识到阻止改革将是徒劳无益的。20世纪之初的10年内发动的颇具朝气的现代化运动，引进了一系列的新观念，如置办新学、废除科举、操练新军等，对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做了一些让步，以缓和革命，从危机中挽救自己的反动统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使清政府的所谓‘新政’失去了欺骗作用。清政府又玩弄了一种‘预备立宪’的新花招，借以削弱革命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当时，‘宪政’虽在全国喧嚣一时，但在新疆，巡抚联魁却以‘新省人民程度过低，尚乏合选举资格之人’，因而‘选举尚难实行’，极力主张新疆处在‘筹备宪政，酌量变通的阶段’。

全国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到新疆。当时不少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纷纷由内地带来革命的火种，进入伊犁、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区，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激起了新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潮。12月28日，刘先俊等人率百余人在迪化起义，终因寡不敌众，完全失败。10天后，声势浩大的伊犁起义爆发，并取得胜利。伊犁临时政府成立，即宣告了清朝在伊犁反动统治的结束，它受到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各民族一些上层人物，也均表赞助，并在物质上给予支援。

伊犁起义是辛亥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功绩在于推翻了清朝在新疆的反动统治，建立了共和，从而粉碎了宣统西迁

的阴谋，使清朝不能将新疆作为它东山再起的根据地。同时，也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在新疆的侵略势力，其意义是重大的。但是，伊犁革命党人不敢发动和组织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加上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最终遭到了失败。伊犁起义失败以后，新疆的政治进入了以杨增新为代表的旧军阀统治时期。

二、杨增新的‘保境安民’政策与新疆的相对安定

清王朝土崩瓦解的时期，也是英俄帝国主义觊觎、染指新疆，策动外蒙独立，煽惑民族分裂主义的危机时期。当时的新疆不仅面临国内数百万两协饷断绝、经济崩溃的边缘，而且处于烽烟四起、社会动荡岌岌可危的局面。杨增新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担任新疆都督的。他首先解散了伊犁临时政府，分化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继而镇压哈密维吾尔族农民起义和南疆哥老会；接着妥善处理了自俄国逃入新疆的 30 万哈萨克、吉尔吉斯难民；然后挫败了沙俄染指阿山（阿勒泰）的阴谋；紧接着又配合苏俄政府解决了窜入新疆的 4 万沙俄白匪军，使新疆进入一个社会比较安定的时期。杨增新从 1912～1928 年，在新疆实行专制独裁 17 年，是新疆近代史上执政最长的一个统治者。从其出身和仕途看，他无疑是一名封建官僚、清王朝的遗臣。袁世凯称帝时，他呈表劝进，是其封建性的强烈表现。但是，他又是在清王朝覆灭、民国肇始时，审时度势，改弦更张，成为中华民国的新疆都督的，说明他又并非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复辟人物。他赞成共和，拥护中华民国，对历届中央政府虽然抱着‘认庙不认神’的态度，但对中华民国这个庙确虔诚不二。他所任的这届政府在政治上的业绩却是应该肯定的。

（一）结束新疆两权并立的局面，恢复新伊统一

1912 年伊犁革命后，以杨缵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把革命果实拱手相让，推举原清朝伊犁将军广福为都督。同

年5月18日，北京政府又任命杨增新为新疆都督。新疆出现了两督并存、两权分立的局面。袁世凯为泯争端，改任广福为伊犁镇边使，允许仍循前伊犁将军之旧，管辖伊犁地区。这种处置虽然改变了两督对峙的格局，却没有结束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反而使伊犁割据合法化。此时，沙俄屯兵边境，虎视眈眈，企图重温昔日分裂新疆、占领伊犁的旧梦。面对外敌压境，原来两军对垒、剑拔弩张的新伊双方深明大义，走到一起来了，这是中华民族有很强凝聚力的表现。几经协商，双方议定的《塔城协商条件》一致确定：新伊关于内外政策，均宜合作，不宜分治；一切建设以省府为全疆行政立法的最高机关地点，以归统一；杨增新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塔城协商条件》的意义在于从法律的角度上结束了两权分立的局面。从1912年7月《塔城协商条件》的签订，到1914年2月，伊犁、塔城官制的改革，其间经历了1年7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伊犁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力量虽然瓦解了，但沙俄的侵略野心被遏制了，新疆避免了一次政治上的分裂。

（二）将阿尔泰特别区（今阿勒泰地区）纳入新疆行政区域管辖，避免了国土的沦丧

阿尔泰东连外蒙科布多，南隔沙漠与新疆的奇台、阜康、绥来（今玛纳斯县）诸县遥遥相望，西南紧邻塔城，西北与俄国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清朝收复新疆后，一直隶属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阿尔泰和科布多实行划地分治，改科布多办事大臣为阿尔泰办事大臣。民国成立后，阿尔泰办事大臣改为阿尔泰办事长官，直至1916年6月，阿尔泰一直为独立的行政区，与新疆并行，直属中央政府管理。阿尔泰之设官分治，清政府原意是促使其独立经营，加固西北边防。但十几年来，历任长官皆非贤能，独立军镇的地位并未建

立起来，只是依赖外蒙古为藩篱，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环峙并列作为屏障，勉强维持。及至 1911 年（宣统三年）11 月 10 日外蒙古独立，昔日屏障不复存在，阿尔泰孤悬塞外，面对沙俄的觊觎、外蒙的窥视，其脆弱之边防原形毕露。1912 年，在沙俄策划下外蒙古攻占科布多城，进而攻打阿尔泰地区，直接危及新疆的安全。杨增新认为，阿新唇齿相依，“阿存则新疆可保，阿亡则新疆难以独全”，竭尽全力，援助军队，协济粮饷，保全了阿尔泰的完整。在沙俄企图攫取阿尔泰的危急时刻，新疆省政府领导人不以自保为重，伸出援助之手，将阿尔泰纳入新疆行政区，是巩固西北边防，避免国土沦丧的重大措施，是有利于祖国统一，有利于民族利益的丰功伟业。

（二）抵制帝国主义势力对新疆的渗透和颠覆活动，维护了国家的主权

1912 年 5 月至 1913 年 7 月，沙俄趁辛亥革命之机，以保护俄领事和商人为由，派兵数千人入侵伊犁、喀什和承化寺（今阿勒泰），企图占领、蚕食新疆；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日、英帝国主义以及沙俄驻新疆领事妄图派兵入新，染指新疆边防，将新疆变成反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数万沙俄旧军队窜入新疆与沙俄驻新领事相互勾结，要求新疆派军队阻击苏俄红军，妄图东山再起。沙俄不仅在军事上入侵新疆，而且要求在新疆享有自由耕种、渔猎、居住、建筑以及不纳税的特权，进行各方面的渗透。德、英、日帝国主义及土耳其都企图利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扩大其思想方面的渗透。杨增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据理抗争，刚柔相济，有理有节，尺寸之土、毫末之权没有丧失，从而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利益。应该说，这一时期是新疆涉外事件最多最复杂的时期之一，也是外事交涉最成功的时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杨增新晚年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治理新疆17年来，只可说做到保境安民，其余教育、交通……都未办好，也未扶植地方人士，一切陈旧无进步，应付以前的环境可云勉强，可是面对现在和未来的局面却不够了。”“我顾虑我去世后，新疆因为没有继承我的人，会遭遇大乱。’这段自我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对其身后新疆前途的预测也是准确的。应该如何看待杨增新总的施政纲领‘保境安民’政策呢？从本质上说，‘保境安民’不过是‘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停滞不前”。他的抱残守缺、封锁禁锢、专制独裁、诛锄异己、无为而治、愚民御民、以夷制夷等等自然都在否定之列。但是从客观上看，如果把它放在全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活动这个大的政治环境中去看，杨增新能做到消弭战乱，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无疑在旧中国的省份中并不多见。杨增新的治疆方略，并没有给新疆带来繁荣昌盛，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新疆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社会危机在他身后不久爆发了。延缓的只是爆发的时间，而积蓄的政治能量却更大了。

三、30年代新疆的政治动乱和社会、经济的大倒退

金树仁上台后，基本上承袭了杨增新的一套政策和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树仁的统治，乃是杨增新统治的继续。但是，金树仁的政治眼光、干练程度远不如他的前任，特别到了后期，一意孤行，把新疆的政治局面搞了个乱七八糟，使新疆由安定走向动乱。

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本来就存在的严重的社会矛盾，金树仁登台后丝毫没有解决。反而，由于政治腐败、扩编军队、增加捐税、滥发纸币和对羔子皮实行贸易垄断等问题，使原有矛盾更加激化起来，以致爆发了反对金树仁政权的哈密农民起义。

1931 年 2 月，哈密小堡发生驻军卡官强娶维吾尔族民女而被杀的“小堡事件”。“小堡事件”是哈密农民武装起义的导火线，深深蕴藏在农民心中的愤懑情绪，就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原哈密王府的一些大小头目乘机参加了起义队伍，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统治经验，掌握了起义队伍的领导权，起义首领和加尼牙孜和哈密王之子聂孜尔的合流，使哈密农民反对金树仁专制政权的起义蜕变为复辟王制的一场暴乱。他们除将甘肃逃荒难民全部杀戮外，还对当地的汉族居民任意屠杀，甚至早年游牧到哈密的蒙古族牧民也遭驱杀。就这样把一场正义斗争变成了民族仇杀，使农民起义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

在和加尼牙孜与金树仁军队相互对峙的时候，在甘州地方军阀争战中吃了败仗的骑兵三十六师师长马仲英决定兴师入新，准备在反金斗争中扩张自己的势力，企图在新疆夺取一席之地。从此，和加尼牙孜和金树仁政权之间的斗争，从复辟王室的暴乱演变成大小军阀之间长达 3 年之久的混战，导致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大动乱、大倒退，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和祸患。

正当盛世才、张培元、马仲英在北疆拼杀时，1933 年 11 月，在南疆重镇喀什出现了一个由英帝国主义扶植的、以分裂祖国为目的的伪政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这个伪政权是英国对新疆侵略政策和亚洲总体战略的产物。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英国就扶植阿古柏在南疆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作为打入中国西北领土的一个楔子。这一次不过是故伎重演，策动南疆从新疆分裂出去，将其作为谋划中的大伊斯兰教国的一部分。

伪政权对内实行伊斯兰教法和极端民族主义，宣布成立独立国家；对外则派人到印度、阿富汗、伊朗、苏联等国要求承认和军援。但是，分裂是不得人心的，因而注定它是短命的，出

笼不到3个月的伪政权就土崩瓦解了。3个月的分裂闹剧在20世纪新疆政治演变史中虽然只是一股小小的逆流，但它留给我们沉思的东西却是异常深刻的：第一，西方敌对势力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一直策划着新疆的独立，妄图把新疆从祖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这个对华政策总的战略目标至今没有改变过。第二，新疆各族人民群众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面对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分裂活动，都能迅速团结在合法政府的旗帜下，同仇敌忾，粉碎各种侵略势力和分裂活动。第三，分裂活动总是不得人心，遭到人民的唾弃，是永远不能得逞的。它只是20世纪新疆百年政治中的一股小小的逆流而已，永远不可能阻挡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但是，其在政治上的负面影响和流毒将长期遗留在新疆的政治生活中，毒害着人们的思想，清除这种政治遗毒远比摧毁一个分裂政权需要的时间更长。

四、新疆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共产党人的活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由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加上英、美帝国主义对日本侵略者的怂恿，大片国土沦丧，中国沿海地区及腹地先后被日军铁蹄践踏，西北和西南地区成了抗日的大后方。新疆地处西北边陲，毗邻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新疆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抗日战争中必将起到其他省区所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根据刚刚签署的中苏互不侵犯的有关条约，苏联开始支援中国。大批军火、物资、药品、飞行员、军事顾问源源不断地从苏联边境进入新疆，经过甘肃、陕西到达抗日前线。1942年后，英国援华物资也由苏联中亚地区，经新疆运往中国内地。新疆成了重要的国际交通要道。

中国共产党为了确保新疆这条国际交通线的畅通，为了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为了把新疆真正建设成巩固的抗日

大后方，于 1937 年 10 月，在迪化成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办事处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政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当时，中共与盛世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客观条件是存在的，并且基础比较好。一是盛世才早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曾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二是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三是支持、迎接西路军左支队进疆。从盛世才来讲，他想倚重苏联和中共提高自己在国民党和在新疆的地位，坐稳统治。正因为盛世才、苏联和中共三方互有需要，彼此之间有难以割舍的联系，所以新疆这个国际交通要道，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畅通无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既是一条军事运输线，又是一条政治通道。对此，曾在 1937 年任中共驻新疆第一任代表的陈云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盛世才是个军阀，而且有很大的野心。他与苏联和我党建立联系，在他是想借助苏联来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向国民党闹独立性；在苏联是想稳住他，求得那段边界线的安定；在我们是想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保持一条与苏联之间物资与人员往来的通道。”

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工作，与内地不同，与盛世才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考虑到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封建势力很强，宗教意识浓厚，当时新疆还没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基础；考虑到反帝、亲苏 、民平、和平、清廉、建设 ‘六大政策 ’是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制订的，是适合于新疆当时实际的一种进步政策。中国共产党认为，完全可以利用 ‘六大政策 ”，完成抗日救国、建设新疆的历史使命，中共决定了在新疆的工作方针：不宣传共产主义，不发展党的组织，不公开党员身份，主要工作是帮助盛世才执行 ‘六大政策 ”。

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与盛世才刚刚建立不久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尽管本身干部十分缺乏，仍然应盛世才的邀请，选调了以陈潭秋、毛泽民为首的100余名共产党员抵新。这些干部被派到各级行政机关、军队、新闻、文化、教育等部门及民众团体担任领导工作。他们实施财经改革，开展对苏贸易，使新疆财政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废除封建的乡约农官制度，建立了民选的农村组织制度；革新和发展了文化教育事业；使新疆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有了一定改善。他们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密切联系群众，纪律严明，清正廉洁，扬善惩恶，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与旧政权的贪污腐败、官僚衙门作风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各族人民中为中国共产党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活动最早应该追溯到30年代中期，首先是以中共早期党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俞秀松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从苏联到新疆工作，接着就是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的400余名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代表陈云、滕代远的迎接下进入新疆，连同陈潭秋为首的那一批，总共有3批数百人之多。这些共产党人中有不少人为争取新疆各族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中国共产党给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影响是永远磨灭不了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理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主张，所播下的革命火种，以及哺育、培养的一批像阿巴索夫、杜别克、乔国仁那样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坚强的革命战士，为迎接全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打下了较好的思想和政治基础。

五、国民党势力全面入新和三区革命

1941年6月后，鉴于整个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盛世才一步一步向右转，积极投靠蒋介石，疯狂迫害中国共产党在新人士，彻底消除苏联在新势力。随后，又与进疆的国民党中央大员发生严重矛盾，黯然离开了主政11年的新疆。这标志着盛

世才在新疆反动统治的结束，新疆进入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党势力入新，意味着国民党政府对新疆这个边疆省的直接统治和管辖，结束了自杨增新以来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的半游离状态，特别是将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财政、金融、币制和外交等纳入中央政府的运行轨道，而在过去，这是无法做到的。但是，国民党在接管盛世才政权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盛世才所留下的政治遗产。盛世才统治后期实行的是一条反苏反共、独裁恐怖的政策，历次臆造的‘阴谋暴动案”，造成冤狱遍地，无数人家破人亡，社会动荡、经济萧条、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处于极度的恐慌和不安之中。朱绍良上台伊始，曾提出一些冠冕堂皇的口号，采取一些欺骗民众的措施，但是，国民党政府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其反共、反人民的政策。1944年前后，新疆的革命条件已经成熟，就在盛世才下台、朱绍良和吴忠信在新疆立足未稳之时，一场震撼天山南北的各民族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运动——三区革命终于爆发了。因为这场革命发生在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个地区，因而被称为‘三区革命”。

从三区革命的对象和任务看，三区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它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政治上平等、经济上繁荣、文化上发展的新新疆；从革命的领导力量和革命的基本动力看，三区革命是由进步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的基本动力是贫苦农牧民；从革命阵线上看，三区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苏联的影响和支持下发生的。三区革命是新疆地区现代革命史上一次重要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明确肯定：三区革命‘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具体来讲，有以下几点：（）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翻了三区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促进了全疆各族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觉悟和勇气；(2)牵制了国民党在新疆的军事力量，配合和促进了新疆的和平解放；(3)培养了一大批本地民族的干部，训练了数以万计的指战员；(4)通过统一战线组织——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团结了新疆各族爱国进步人士，统一了新疆当时的民主进步力量。

当然，三区革命在某些问题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并发生过严重的错误，其中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示。这些历史启示主要是：(1)要始终坚持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独立和分裂活动；(2)要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反对任何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和民族仇杀的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3)只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才能识别、抵制、反对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4)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的核心力量，是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华民族的解放，才能使新疆各族人民获得彻底解放。

六、新疆农业区的减租反霸与土地改革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兵团二、六两军挺进甘肃酒泉，接近新疆大门星星峡时，经过中国共产党多渠道的争取工作，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新疆保安司令包尔汉率新疆军政人员，分别于1949年9月25日和26日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新疆的解放意味着西北能够早日结束战争和早日进入和平建设，意味着西北能够早日分兵参加解放西南，最后解放全中国，结束全国战争，实现全国和平。

与全国其他省区不同的是，新疆解放前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地方工作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到驻疆人民解放军肩上。驻疆部队曾为此派出大批军队干部帮助各地建立各级地方党委

和政权机构，并担负起领导人民发展生产、培养本地民族干部和进行社会改革的艰巨任务。

1949 年 12 月 28 日，彭德怀在向毛主席的报告中对新疆的民主改革进程做了如下的表述：‘由于新疆土地集中，剥削较内地更严重，因而进行土地改革要经过比内地更为缓慢的过程，并且必须在启发各民族内部基本群众的阶级觉悟和培训本民族骨干，与人民解放军密切合作的基础上去执行，才不致犯错误。’这段论述可视为新疆民主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内地在解放区已经完成土地改革、新解放区开始减租反霸的情况下，新疆执行‘比内地更为缓慢’的方针，无疑是符合新疆实际的，也是符合中央对新疆民主改革的基本方针的。为此，新疆分局采取了稳重和谨慎的步骤和政策，这些步骤和政策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

1. 鉴于治安工作、群众准备、干部准备三方面条件的不成熟，原先的部署是：1950 年不进行土改，减租也只能在部分有条件地区进行。实际上，新疆的减租反霸从 1951 年 9 月开始，至 1952 年结束。而土改则从 1952 年 9 月才开始分期分批有步骤地进行，直至 1954 年 2 月才胜利完成。

2. 普遍开办干部训练班，吸收各民族工农积极分子和知识青年参加学习，并提拔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担任领导工作，以担负民主改革的指导工作。

3. 对宗教人士阿訇作具体分析，不是一般地提出反对阿訇的口号，不仅不取消阿訇，而且还将阿訇包括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内，争取其中爱国人士赞助民主改革运动。谨慎处理阿訇中的地主恶霸问题，阿訇中必须按地主恶霸处理的，不和阿訇混为一谈。

4. 在减租反霸中，适当照顾参加过三区革命或在国民党统

治的7个行政区参加过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地主成分的民主人士。1952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下发《关于长期保护上层党外人士及专家的规定》，决定在土改运动中，对上层党外人士及专家采取团结教育和保护的政策，并指出保护对象的具体范围。凡列入保护名单的人物，今后对一切有关的重大问题的处理，一般均须当地党委讨论，分局批准，重要者（如在某一民族、教派、部落中有全面影响的人物）须报请中央批准后执行。

5.为了更好地团结中农，增加农会反恶霸斗争的力量，允许靠自己劳动谋生为主的富农分子参加农会，但不能掌握农会的领导权。

6.减租反霸只限于农业区，不用处理地主土地的方法处理牧主的牲畜，牧主和牧民之间的纠纷通过调解适当解决。牧区工作主要是集中力量肃清土匪，保持社会稳定。牧区不提反霸口号，对于罪恶证据确凿的，必须法办的，作为现行反革命犯惩办，不笼统提清算牧主，保护一般牧主的守法经营。坚决保护畜牧业，禁止破坏。

7.明确规定清真寺、拱拜及喇嘛寺的土地一律不动。游牧区和半农半牧区一律不进行社会改革。

8.在民族地区尽量少杀人。对于应该杀的人，也大部分采取判刑监禁或判死缓的办法，只杀少部分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

由于以上具体政策和策略，是根据新疆民族、宗教等特点而制定的，是坚持从新疆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它充分体现了各族人民群众的意愿，也适当照顾了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利益，所以新疆的民主改革虽然面临着复杂纷繁的局面，却能少走弯路，少犯错误，能够比较健康、顺利地发展。

七、新疆牧区的社会主义改造

新疆是我国的四大牧区之一。新疆牧区包括以畜牧业为主的22个县和畜牧业占有一定比重的33个县。畜牧业经济在新疆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牧主经济不同于地主经济，它具有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经济性质。因此，对牧区改革必须执行完全不同于农区的正确政策，这个政策的核心内容应当是逐步取消牧主在政治上的封建特权，但又坚决保护牧主经济，并鼓励其发展畜牧业生产，使其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1952年七八月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新疆第二届代表会议，在分析了牧主经济的性质后，确定新疆在一个长时间内，党对牧区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是：肃清土匪，安定社会秩序；保护包括牧主经济在内的畜牧业；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医疗、贸易工作；培养当地民族干部，逐步建设民主政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发展畜牧业生产，适当改善牧工和贫苦牧民的生活。并规定了对牧主经济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实行牧主牧工两利等政策。这些政策一直执行到1956年上半年。

1955年5月召开的自治区第三届牧区工作会议集中讨论了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畜牧业生产的问题。农业合作化了，畜牧业怎么办？是趋同，还是坚持有别于农业区的做法？会议认为，畜牧经济中存在着牧主经济和个体牧民经济两个部分，对二者的改造应采取不同方针：对牧主经济的改造执行公私合营，建立公私合营牧场，然后转变为国营牧场；也可以根据情况有区别、有限制地允许某些牧主加入畜牧业生产合作社。对于个体牧民经济的改造，则实行个体牧民经济合作化。对于资本家兼营畜牧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办法，凡是要求与工商业一并合营的大群牲畜，可以‘赎买’方式接受合营。

新疆畜牧业的改革，从1956～1958年，已基本实现生产合

作化。鉴于牧区的社会历史情况和工作基础不同，牧区的社会主义改造显然有别于农业区的做法，采取一种更加慎重的方针，主要原则有：(1)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不办高级牧业社，现有牧业社不区分初级社或高级社；(2)牧业社或公私合营牧场规模要根据自然情况、历史关系、方便牧民生产生活和有利于经营管理来确定；(3)牧民、牧主自留畜，根据生活习惯和需要确定；(4)实行保股保值，不实行保股保畜，以利发展畜牧业生产；(5)在保证增加牧民收入的前提下，适当增加牧业社的公共积累；(6)对参加公私合营牧场的牧主做好安排工作。

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954年10月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决定建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兵团的建立是一种创举，是毛泽东屯垦思想在新疆的成功实践。兵团不是一般的农垦部队，而是一支武装的生产部队；不是一般的企业组织，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集体转业为基础，肩负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历史使命，执行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三大任务，工农兵学商结合、党政军一体的特殊组织。它是自治区经济建设的强大力量，民族团结的强大力量，维护治安、巩固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强大力量，保卫祖国边防、巩固祖国统一的强大力量，也是汉族人民支援兄弟民族进行建设的一种有效形式。

新疆地处祖国的西部边陲，有5400多公里的国境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新疆又是祖国最大的一个省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亟待开发建设。兵团就是在这样一种客观环境中应运而生的，兵团的诞生和发展是新疆客观实际的需要，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40多年来，兵团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

1. 兵团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继承发

扬了人民解放军生产队、战斗队、工作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认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它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无论在什么艰难的情况下，都能顽强地克服困难，争取时间和创造条件去完成任务。

2. 兵团的经济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开发性的绿洲经济。它以社会主义大农业为基础和主体，同时实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实践证明，兵团的事业要迅速发展，必须坚持多种经营的方针，不能搞单一的农业经营。

3. 社会主义大农业必须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必须尊重人才，重用人才。兵团的大农业从手拿坎土曼垦荒开始，到大规模的机械化、园林化、水利化、化学化生产，经历了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尊重科学，重视人才，重视应用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的过程。

4. 必须积极实行经济改革，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推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创办家庭农场，发展多种经济成分，调整生产关系，彻底打破起源于军事共产主义性质供给制的“大锅饭”、“铁饭碗”，进一步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才能激活兵团经济的活力。

5. 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断增强民族团结，是兵团顺利发展的基本条件。兵团的事业是党的事业，同样也是各族人民的事业，它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借口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限制、削弱以至损害兵团的事业，或者侵犯人民群众的利益，满足自己局部的需要，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是错误的。

九、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